

三月三 送炒粉



炒粉桶 (周衍平 摄)

炒粉糕 (王肖飞 摄)

乡愁

方秀英

下班回家，隔壁邻舍一帮人坐在我家门前聊天，问我出嫁时是否有炒粉桶作陪嫁。我说没有。章阿婆就说：“没有陪嫁炒粉桶，就别给你妈送炒粉了。”哦，又到送炒粉的季节了，老阿姨们明明知道我们这代人作兴这陪嫁了，这一招欲擒故纵，明显的暗示呀！

亲去外婆家送过几次炒粉糕，有时图方便，是未做成糕的炒粉。最爱送炒粉，不像炒粉糕排得齐整，吃掉一根便能看到。姐妹俩一路上轮流提着炒粉桶，嘴馋时凑在一起，拿糙树叶当瓢舀，你一下我一下偷吃几口，炒粉点不落，撵几下，再把桶里的粉摇匀抹平。从自己的村庄山上走到岭头外婆家，不远的路，不歇上三五次却是到不了的，桶里的炒粉自然也浅了寸把，面上看大抵还是平的。外婆接过桶后，开心地笑着，只看我们不看桶，顺手把桶放在矮榻上，生怕我们够不着。

老品牌。旁边还有一家糕点店刚好在现做炒粉糕，便凑了过去，发现老板娘面熟，一谈才知是我同村人，当年我们这些黄毛丫头仰望的村花姐姐。她说，虽然今年有闰二月，但女儿们送炒粉的心已经先到三月了，炒粉早早送起来，唯恐送晚了娘亲要等急。最近糕点店加班加点赶制作，这种手工糕点工序太麻烦，大家图方便，直接到店里买。炒粉糕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有技术含量，把握好五谷杂粮与米的比例、糖的比例是关键，这样才能酥脆。村花姐姐的技艺是当年从她外婆那儿传承下来的，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口味需求进行创新，或加些花生芝麻核桃玉米，或做成无糖的。除了炒粉糕，他们还做香糕、米胖糖等，都是童年时的美食，能唤起人们的美食记忆。她自豪地说，记者也来采访过，并把相关采访视频给我看。我又买了两包，母亲也许能从中吃出家乡的味道。

道老古

一担贝母一船谷

赵淑萍

民间谚语“一担贝母一船谷”，是说贝母值钱。白术、白芍、浙贝母、杭白菊、元胡、玄参、笕麦冬、温郁金这八味中药材，被称为“浙八味”，其中的贝母、麦冬、白术三味，则是宁波所产。浙贝外形比川贝大，故称“大贝母”，味苦而性寒，具有清热化痰、润肺止咳、散结解毒的作用。说到贝母，就要说到樟村。宁波有童谣：鱼米之乡是宁波，资源丰富特产多。奉化蜜桃只只大，慈城杨梅箩箩多。小白西瓜上山坡，邱隘咸芥厨缸做。樟村贝母名气大，还有三北大泥螺。浙贝母，最初由象山农民种植，所以又称“象贝”。明弘治至清康熙年间，有象山人携贝母种子移居到樟村岭下，于是，贝母开始在樟村生根。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贝母生长，开始是副业，后来就成了农户的主业。清初万斯同《鄞西竹枝词》云：“种谷无如种药材，南村沙地尽堪栽”，写的就是樟村一带种贝母的情形。据志书记载，樟溪一带的贝母，鼎盛时期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70%。

在雍正《宁波府志》中又被称为“三法脚坊东直街”，而乾隆《鄞县志》中称“三法脚坊街”。因为明代衙街出了个叫屠侨的官员，明代审判机关实行“三法司体制”，政府设立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个部门，是当时司法、监察的最高主管机关，其主要负责官员被称为“三法脚”。屠侨担任过大理寺卿、刑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中央高官。晚年时，有个叫裴绅的巡按御史，为他在宁波城内衙街的家门口立了一块牌坊，百姓自豪地称这块牌坊为“三法脚坊”，这条街因此也改名为“三法脚街”或“法脚巷”了。当然民间还有一种传言，说叫“三法脚街”是因为这里连续出了三位这样的三法脚，但没有具体史料可查。

贝母的发展史就是樟村的经济史。贝母产业曾撑起樟村的一方天空，而近些年却遭遇了严重的“内忧外患”，市场波动、种源退化、无硫化工后延长保存期等诸多问题，大大打击了当地农户种植浙贝母的积极性，贝母种植由盛而衰。说到贝母，笔者想到宁波城中的一条街，那就是药行街。药行街，东起江厦街、灵桥路口，西至解放南路，中与开明街十字相交。早在唐长庆元年(821年)宁波建城时，这里就是交通要道。据明永乐《宁波府志》记载，药行街当时称衙街，东自车桥，西至新排桥。光绪《鄞县志》载：“街为李氏所创，故名。”李氏到底何时创衙街，不得而知，但明代衙街已经存在。“衙街李氏”始迁祖为南宋祥兴年间的青洲人李守真，是抗金名将李显忠后裔，在南宋末年为了躲避战乱而来宁波居住。李氏后人中多才俊贤良，大名鼎鼎的诗人李邕嗣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条街，

为什么宁波的药材生意如此兴盛?因为清末太平军起义，战乱不断，原本走运河的药材运输通道被阻断。海禁开放后，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宁波航运业发达，川广地区的药材从山道进入宁波后，可以通过宁波航运输送到北方各地。而且，宁波当时是浙贝母、元胡、白术、麦冬等浙药的集散地。而江夏钱庄业发达，这为药行业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。宁波也一度成为全国中药转运集散中心、东南药材中心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宁波老字号药店相继停业，药行街的药业开始衰落，取而代之的是木材行、家具店和杂货铺。20世纪80年代，药行街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，第一百货商店、大同南货店、大有南货店、市交电五金商店、工人文化宫以及市展览馆，都是宁波人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如今，药行街拓宽，鳞次栉比的高楼，大大小小的商铺，集金融、购物、休闲、美食于一体。2020年，海曙启动了中医药特色街区打造项目，中医药特色街区围绕“一街一坊一广场”(即药行街、寿昌坊、药皇殿广场)布局，打造包括诊疗养生、文创旅游和老字号品牌在内的中医药产业集聚区和文化聚集地。也是在2020年，“浙贝故里”试点项目落地章溪村，一些新兴的农创客，用科技与品牌的力量，重新擦亮贝母“金字招牌”。

慢时光

傻姑和小人书

俞亚素

据说，傻姑是城里人。不知怎的，竟嫁到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小村子。对象是住在村尾的贵大叔，彼时已经四十多岁，村里人本以为他会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傻姑的嫁妆很丰盛，其中一部黑白电视机最抢眼，那可是我们村第一台电视机啊!红色皮箱一只又一只，村里的大妈大婶早已偷偷检视过，里面装着新被褥和新衣服。傻姑笑嘻嘻地坐在新房里，穿着崭新的大红袄，发上别着一朵小红花，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只木箱子，看着挺沉。只是无论谁去劝说，她都不肯放下。搬进在房门口的大妈大婶们便交头接耳，这一定是一箱宝贝，说不定就像电影里杜十娘的那只百宝箱，装满了金珠宝玉。有一天，也不知是村里的还是村外的，有个贼人动了坏心思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傻姑的百宝箱。争夺之际，箱子落地，继而开裂，竟然是满满一箱小人书。听到傻姑的哭声，我跟着村里的大妈大婶去看究竟。贼人早已离去，地上摊满了小人书。这哪是什么宝贝呀!众人皆失望离去，我的眼睛却一亮，啊，果真是一只百宝箱!我忍不住上前帮傻姑整理小人书。可是整整整整，干脆坐在地上看起了书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小人书，没想到，除语文书和数学书之外，居然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。我颇有些如饥似渴了。不错，傻姑的书就叫小人书，又叫连环画。大抵是因为它模样珍奇，且书中图文并茂，非常适合小孩子阅读，所以人们才习惯称它为小人书。且说我和傻姑，从此后便做了一对好朋友。那时，傻姑应该有二十来岁吧，我也就十岁光景。可是在我眼中，她似乎跟我一般大。傻姑不识字，因为她连铅笔都握不好。我曾经想让她写下自己的名字给我看，便递给她一支铅笔。谁知，她像孙悟空握筷子那样一把握住笔，然后乱涂一气。因此，她看小人书时只看书上的图片。我毕竟上了两三年学，识了一些字，喜欢看图片，也喜欢看文字。而且正是“好为人师”的年纪，有时我便会和傻姑玩“老师和学生”的游戏，我让傻姑坐在小凳子上当学生，我则像老师一样站着给傻姑讲小人书上的故事。我让傻姑喊我俞老师好，又让她坐端正，不能乱动。然后，我开始声情并茂地讲故事，讲《小兵张嘎》，讲《三打白骨精》，讲《鸡毛信》……傻姑听得认真，一会儿点点头，一会儿咧开嘴笑。她的这副样子，让我小小的心一时充满了大大的成就感。多年后，我竟然真的成了一名老师。傻姑陪嫁过来的电视机就放在他们家的饭厅里，那饭厅已然成了村里大人小孩的免费电影院。傻姑居然不爱看电视，只喜欢看小人书。那些小人书，明明看了又看的，可是她百看不厌。我曾偷偷怀疑过，莫非她上辈子读书读傻了，导致这辈子依然傻乎乎地只喜欢看小人书?我喜欢看电视，也喜欢看小人书，可是为了陪傻姑，我也常常和她一起看小人书。为这事，村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说我也是个傻瓜。我是不晓得生气的，母亲听了很不乐意，便时常拿了我的奖状在他们面前炫耀。其实他们不知，在很长很长的一段岁月里，正是傻姑和她的小人书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欢笑和快乐。以致往后的某些日子里，每每想起傻姑，每每想起小人书，便会有有一股暖流穿胸而过。傻姑是在我读高中时去世的，也不曾听说她得了什么病，就这样突然地走了。就像那年，她突然地嫁到了我们的村。她的小人书被贵大叔焚毁了她的墓前，一本未留。我听说后，心头着实唏嘘了一阵。

文化游

喻语 文/摄

玉洁冰清自梳女



冰玉堂

早就听说，广东佛山一带有自梳女群体。自梳女居住的“姑婆屋”中，数顺德均安镇沙头古村的冰玉堂最为出名，如今，则成了民俗博物馆。在小巷深处遇见幽雅的冰玉堂，这是带有岭南乡村特色的普通民居，为两层木楼，小院又呈现着典型的南洋建筑风格。沙头古村的一名热心辅警得知我们远道而来，特意请了他在冰玉堂做义工的梁妈妈陪同参观。我问梁妈妈，自梳女群体是怎么形成的?梁妈妈热情地讲了个故事：很久以前，顺德容奇镇有一胡姓人家，有五个女儿。大女儿嫁给有钱人家做“守墓清”(嫁给已去世的男人);二女儿嫁给富商做妾，不堪丈夫和老婆婆打骂，还有家公调戏，跳井自杀;三女儿嫁给一个穷石匠，丈夫采石受伤，不能动弹，她被迫上街乞讨;四女儿嫁给穷苦人家，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……五女儿看到姐姐们的生活悲剧，决定永不嫁人。父母无奈之下只得顺其自然。五女儿便梳起发髻，自食其力。民间传说已无法考证其真假。翻阅冰玉堂里的资料获悉，自梳女是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近百年间，在珠三角地区出现的选择“终身不婚”的女性群体，她们将头发梳起，不结婚，不生子，独自跨洋到陌生的地方辛苦打拼，安身立命。另有乾隆十五年《顺德县志》记载：“女多娇羞之行，乡中处女每与里女结为姊妹，相为依恋，不肯适人。”到了清末，“自梳女”现象兴起如潮，20世纪30年代，顺德的“自梳女”有万人之多。女子决定自梳以后，就选择吉日，用浸有黄皮叶的热水沐浴

净身，穿上新衣，在知心姊妹的陪伴下，到庵庙请尼姑念经解难。然后由年长自梳女解开其长长的青丝，梳成云鬓。梳时念念有词：一梳是福，二梳是寿，三梳静心，四梳平安，五梳自在，六梳金兰姊妹相爱，七梳大吉大利，八梳无难无灾，九梳合闭双目，于内心静穆中，完成从女孩到自梳女的转变。形成此现象的原因复杂，当时珠三角丝业繁荣发展，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，为了照顾家庭，一些女子无奈中自愿终身不嫁，便去“自梳”。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曾有调查：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，容奇一带缫丝女工每天收入一元二毫至一元三毫，收入不低。20世纪30年代末，华南地区丝业因战乱受重创，丝价暴跌，从事缫丝业的自梳女便相约结伴，外出打工。她们中许多人在香港或东南亚一带的富裕家庭当用人。我问梁妈妈：“村里还有健在的自梳女吗?”“嗯……有，最后一位了，90多岁了。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她年轻的时候。”

照片上的年轻女孩嘴角微微翘起，五官端庄，穿着民国时期的衣服，落落大方，很有气质，清澈的眼睛里却掩不住内心的迷茫。“您能不能带我们去见她?”在些许迟疑之后，梁妈妈说：“嗨，我带你们去见黄姑太太。”紧随梁妈妈来到黄姑太太家，接待我们的是家中的保姆。跟着保姆走进房间，见3个年轻人正围着一老人聊天，原来是广州的一家媒体在采访老人。坐在床上的老人看上去精神不错，皮肤黝黑发亮，脸庞饱满，眼神中有九旬老人难得的光亮，但已经很难和在冰玉堂见到的她年轻时的照片联系起来。“她胃口很好，就是两腿走路不方便了，记忆力也时好时差。”保姆阿姨在一旁说。老人叫黄瑞云，沙头村人。年轻时，家庭贫穷，兄弟姐妹十几个，父亲重男轻女，让哥哥们读书，她和姐妹早早做工。年轻时也没有遇到心仪的男人，只想赚钱补贴家里，就自梳了。后来来到新加坡做用人，赚了钱就寄给妈妈。70岁时回乡养老。

黄姑太太笑着说：“能出去打工的都是聪明能干的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谁说不想找对象呀，那时候没条件，又没碰上喜欢的人，呵呵……”“早年间沙头村自梳女多，出去打工的也多，特别是下南洋的女孩，勇敢自立，勤劳节俭，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和亲人，赚下来的钱都寄回家里。20世纪80年代，村里第一批新建的楼房，将近一半是用姑太太(对自梳女的称呼)们寄来的钱造的……”保姆阿姨动情地说。据《顺德县志》载，从1886年至1934年，仅沙头村就有500多名自梳女在新加坡打工当“妈姐”。按自梳习俗，自梳女不能在家终老，她们只能在村里的姑婆屋居住。自梳女们在异国他乡思乡心切，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故乡。1948年，在新加坡工作及留在本地的共500多名自梳女，合资在沙头村兴建冰玉堂。1950年，冰玉堂在政府的支持下竣工。2008年11月，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。20世纪90年代，最后一批自梳女陆续回到家乡，姐妹们聚集一堂，相互陪伴。当家乡和乡亲有困难时，这些老人毫不犹豫地早早辛苦打拼来的积蓄慷慨解囊。冰玉堂中的一张张捐赠单、一幅幅照片，见证了她们对家乡的热爱和扶持之情。当我离开冰玉堂，心中五味杂陈：自梳女或因为生活所迫，或想自食其力，或出于某种无奈，走上了自梳之路。这也许是当时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崛起，但在那个强调贞洁的年代，为自己梳起，等于嫁给自己，也要为自己守节，如违背初衣，轻则会被人羞辱，重则被塞进笼子沉入河中。这种悲哀，又使得自梳的权利和女权意识是不完整的。如今，自梳女以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玉洁冰清的余香，为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反思。